

蘇區小學課本中的 規訓和動員

• 張凱峰

土地革命時期 (1927-1937) 是中國共產黨初次嘗試通過農村武裝割據建立政權的時期。在國民黨連續重兵圍剿的壓力之下，小學教育令人意外地成為蘇維埃政權格外重視的工作內容。蘇區的小學教育究竟有何奧妙？筆者認為，作為由一支外來武裝剛剛建立起來的政權，中共要想最大限度地動用農村的人力物力資源，以滿足反「圍剿」作戰的要求，就要對農民進行革命動員，使他們參與到「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當中來，並且盡可能地破除舊的農村基層文化權力網絡的滯礙。此外，中共還必須在農村基層政權建立起來之後，對原生態的農民加以規訓，使之符合現代國家的戰爭需要。普遍的小學教育可以幫助蘇維埃政權實現這個關乎命運安危的任務。

中共要想最大限度地動用農村的人力物力資源，以滿足反「圍剿」作戰的要求，就要對農民進行革命動員，並對原生態的農民加以規訓。普遍的小學教育可以幫助蘇維埃政權實現這個關乎命運安危的任務。

通過對《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 (1927-1937)》收錄的蘇區小學課本內容加以爬梳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為這種規訓和動員所做的各種努力，同時也能夠管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個政權的現代性。

一 鄉村革命的發動

要動員農民跟從中國共產黨起來革命，首先必須從邏輯上證明這種革命的必要性。生活在偏僻落後山區的蘇區農民的政治意識相當薄弱，革命的烽火並不會因為紅軍的到來而自動點燃。1929年毛澤東、朱德帶領紅軍到達江西省寧都縣的小布圩時，「小布圩的老依聽說兵來了，都慌慌張張地躲起來。因此，圩鎮裏到處都關門閉戶、冷冷清清的。」^①所以革命動員的第一步是通過渲染生活的困苦，喚起農民對現實生活狀況的不滿情緒，並且將導致這種不幸生活的根源指向土豪劣紳^②。

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教育部編寫的《共產兒童讀本》第四冊中就有一首適合傳唱的《農民苦歌》^③：

一朝起來做到夜晚，衣食都不得暖飽，苦生活何時減少，哎喲哎喲，苦生活何時減少。

六月割禾真辛苦，點點汗滴禾下土，田主們快活收租。哎喲哎喲，田主們快活收租。

無錢買米活家小，兒女無知偏跳號，親爹娘，我肚餓了，哎喲哎喲，親爹娘我肚餓了。

呈現強烈對比的是，田主快活收租，農民卻不得溫飽。《列寧初級小學校適用國語讀本》第一冊中有如下比喻^④：

我家一隻大肥豬，坐吃不做事；下屋一隻大土豪，也坐吃不做事。
吃了飯，要做事；吃飯不做事，便是寄生蟲。寄生蟲，誰也不能容。

吃飯不做事的地主被比喻為寄生蟲，暗示着他們應該被消滅；而比喻為大肥豬，則暗示着他們應該被殺掉，而農民可以從中獲得實惠。土豪劣紳存在的不合理性隨即被點了出來。接下來教材便開始直接號召學生消滅土豪。《列寧初級小學校適用國語讀本》第二冊中說^⑤：

一個土豪，坐在家裏，收租吃飯，屠殺工農，壓迫群眾。小同志們！團結起來，消滅這個寄生蟲！

小學課本的動員常常以兒童遊戲的形式出現：「晚飯後，我和哥哥弟弟妹妹，同到草地上做遊戲：哥哥扮土豪，弟弟扮做劣紳，眼淚汪汪，宣布自己死刑。表演得很好，使我們看了，拍掌稱讚。」^⑥有時候這種革命動員也會通過詩歌進行，比如「月光光，照四方，四方革命空氣高；靖守匪，無處逃，土豪劣紳齊打倒！」^⑦

《共產兒童讀本》第四冊的二十一、二十二兩課則以師生問答的形式系統地向學生詳細說明了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對象，以及革命的內容^⑧。也有課本以專門的篇目對「土豪」、「劣紳」和「地主」給出了物種學式的定義（何謂土豪、何謂劣紳、何謂地主），清晰地將其與普通農民作了階級區隔，指導具體的階級鬥爭^⑨。

通過「打土豪、分田地」，根據地農村舊的權力把持者——土豪劣紳被打倒，其經濟基礎被摧毀，失去了代表農村與新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討價還價或爭奪農村資源的能力，而蘇維埃共和國則通過與農民瓜分土豪劣紳在土地收入中所佔的份額獲得了經濟利益。不僅如此，土豪劣紳的消失還使得蘇維埃共和國掃除了農村基層社會的阻隔，從此能夠直接與農民對話，動員農村的人力物力為革命戰爭服務。蘇維埃共和國的合法性也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時得到了農民的確認——地權的授予即如同農民與蘇維埃共和國訂立新的契約。

《共產兒童讀本》以師生問答的形式系統地向學生詳細說明了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對象，以及革命的內容。也有課本以專門的篇目對「土豪」、「劣紳」和「地主」給出了物種學式的定義，指導具體的階級鬥爭。

在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任務之後，革命並不是到此結束，階級鬥爭開始進入日常生活當中，農民與土豪劣紳必須始終劃清界限，他們被警告隨時可能遭到階級敵人的暗算。

在《共產兒童讀本》第六冊的一篇課文中，講了兩個兒童過河的故事。兩個兒童在兒童節那天到蘇區去開紀念會。他們顯然是屬於認同於蘇維埃政權的階級。路上他們被一條河擋住去路，請求一個路過的青年揹他們過河，但是該青年對他們稱呼其為「同志」非常不滿，憤怒地拒絕幫助。不久，另一個青年到來，熱情地揹兩個孩子過河，並且告訴他們剛才那個青年很可能是地主富農的子弟，是階級敵人；要階級敵人來幫助，會有不可預知的危險^⑩。另一篇課文中則以具名具地的真實案例提醒農民不要與土豪劣紳有任何瓜葛：中央蘇區樂安縣招攜區一個叫雷洪魁的青年與一個土豪婆結婚，土豪婆將其平日節省的現洋拿走後與之離婚。中央蘇區信康縣金古區的少先隊隊長曹洪飛、游擊隊員古廷梅，與土豪婆結婚後，便隨之一起反水^⑪。

這樣的課文對於小學生來說具有強烈的說教和示範作用，很多少年兒童因而成為鬥爭土豪劣紳的先鋒。

農村的宗教信仰和宗族屬於「權力的文化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會與國家爭奪權力資源，是蘇維埃政權直接支配個體農民的阻礙，因此必須肅清。於是蘇區的小學課本當仁不讓地對宗教迷信進行了討伐。

二 權力的文化網絡之爭

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不只是土豪劣紳，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⑫：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

國家政權已經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轉移到了蘇維埃共和國手中，而農村的宗教信仰和宗族屬於「權力的文化網絡」^⑬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會與國家爭奪權力資源，是蘇維埃政權直接支配個體農民的阻礙，因此也必須肅清。

《共產兒童讀本》第六冊中就提到過宗教迷信與蘇維埃政權爭奪資源的案例：蘇維埃政權以科學的方式組織鄉民防止春疫，但是中央蘇區博生縣（前稱寧都縣）東山壩大布鄉的鄉民卻籌集了一筆很大的款子，請白石祖師廟的道士唸皇經，以求避瘟去禍。看起來鄉民有時候更願意聽從白石祖師而非蘇維埃政權的號令。而中央蘇區瑞金縣的居民則因為謠傳「玉皇要降二斗三升瘟疫，來收人收禾收豆」^⑭，於是家家都做米果敬神。這種做法使得蘇維埃政權在反「圍剿」戰爭中的糧食供應更加緊張。

蘇區的小學課本當仁不讓地對宗教迷信進行了討伐，指出：「這種迷信，是地主豪紳破壞革命的武器，我們革命群眾應該起來反對。」^⑮《共產兒童讀本》第一冊有課文直接質疑菩薩的法力^⑯：

木菩薩怕火 泥菩薩怕水 紙菩薩怕水又怕火 菩薩 菩薩 你有甚麼靈呢

有口不會說 有手不會做 有足不會走 有耳有眼不會聽看 菩薩 菩薩 你有甚麼用呢

《共產兒童讀本》第六冊中有一個關於道士趕鬼的故事，講的是一個自稱能夠趕鬼去病的道士騙錢致富，最終被一個反對迷信的青年裝鬼嚇死，以此來證明宗教迷信的欺騙性，勸導農民不要相信^⑩。

此外，宗族也同樣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在中央蘇區的江西、福建，宗族組織尤為發達，「一般農民雖然十分勇敢，但均在宗族關係之下去作鬥爭，很少爆發鄉村的階級鬥爭。」^⑪這種狀況妨礙了土地革命的進行。教材中就有課文提到在博生縣青塘區大姓分好田、小姓分壞田。瑞金黃柏區也有這樣的情形，並且強房分好田、弱房分壞田。這種按照族姓而非階級分配土地的辦法清楚地反映出土地革命的領導權落入到了宗族的手中。由於小姓往往在經濟上處於被壓迫地位，最先起來要求平均土地的總是他們，於是階級鬥爭變成了宗族鬥爭。站在對立面的大姓自然堅決抵制土地革命。「博生縣還有大姓的富農，領導同姓的人，反對政府土地委員，因為土地委員是小姓，是土地革命的堅決份子。」^⑫

因此蘇維埃政權在土地革命中對宗族的產業大動手術，以圖使其因缺乏物質條件而難以進行宗族活動，因喪失公共經濟基礎而無法維繫宗族成員關係。很多宗族的公田被沒收再分配，祠堂也被充作他用，如學校教室。課本裏就以小學生的口吻提到過：「我們的教室，是一個舊祠堂。……我們把這舊的祠堂桌椅，都弄得很漂亮。」^⑬

為了徹底摧毀農村舊的文化權力網絡，蘇維埃政權對舊有曆法也進行了革命。農民原本在舊的鄉村精英的指導下，按照舊曆（陰曆）安排農村的生產和社會活動，蘇維埃政權則力圖以由自己指導和解釋的公曆（陽曆）取代之。1931年閩西蘇維埃政府特地下發通知，要求農村逢圩（趕集）改用公曆，指出：「舊曆是豪紳地主剝刻工農群眾的記載日子，尤其是過年時節，逼債催租最厲害的日子，……在舊曆中所有各種舊習慣如清明、端陽，過舊年等惡習仍舊是沿傳下來，是很不好的。」^⑭這段話清楚地道出了廢除舊曆的意義：舊曆承載着農村舊的經濟關係，也是舊的文化權力網絡運轉的日程表，如果用一種新的曆法取而代，舊的文化權力網絡也就土崩瓦解。於是，小學教材中也有了這樣的課文：「陽曆比陰曆好，陽曆月大月小有定，陰曆月大月小無定。」^⑮

隨着宗教迷信和宗族勢力被打為革命的對象，舊的文化權力網絡遭到破壞，蘇維埃政權成為了農村社會的實際權威。課本中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中央蘇區興國縣鼎龍區田溪鄉的一個兒童團員向鄉政府報告叔叔聚賭，叔叔因此被抓受罰。於是父親將他打了一頓。這個孩子再次向政府報告，使其父親也受到批評處罰^⑯。在這個事件中，蘇維埃的法律顯然是高於家庭親情的，即使是叔叔和父親，如果違反了法律也要舉報，使之受到處罰。舊的倫理秩序被打破了，孩子找到了比父親更大的權威——蘇維埃。這是中國以往任何一個政權所難以企及的成果。

隨着宗教迷信和宗族勢力被打為革命的對象，舊的文化權力網絡遭到破壞，蘇維埃政權成為了農村社會的實際權威。舊的倫理秩序被打破了，孩子找到了比父親更大的權威——蘇維埃。這是中國以往任何一個政權所難以企及的成果。

三 蘇維埃政權的認同性建構

革命政權初步建立，接下來要做的是鞏固新政權的合法性基礎。課本中出現了今昔對比、憶苦思甜的內容，在《共產兒童讀本》第三冊的第六課中，一個兒童自述從前家裏的窮困境況：做長工的爸爸難以養活全家，剛滿七歲的哥哥幫人牧牛，不但沒有工錢，還要遭人打罵。媽媽給別人家的孩子作奶媽，不得不給生下來只有五六個月的弟弟斷奶^②。第二十六課則是一個兒童自述現在的生活：家裏分了田，爸爸媽媽種的穀子夠吃，還種了一些雜糧，分了一塊木梓山，每年可榨油四五十斤，分了一個池塘，養了很多魚。吃不完的雜糧、油和魚都拿到街市出賣。六歲的弟弟可以在家玩耍，九歲的我可以上學讀書^③。

這種幸福生活順理成章地轉化為蘇維埃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對蘇維埃政權的認同性建構也隨之展開，《列寧初級小學校適用常識讀本》第四冊中說：「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它是指揮全國勞苦工農群眾革命，保障工農利益的最高政權機關。我們應該一致的盡力擁護。」^④

蘇維埃政權通過各種節慶、儀式、標誌物和歌曲建構這種認同性，使之深入人心。如課本中有對紅旗的讚美^⑤：

啊！——好看的紅旗！中間有鐮刀有錘子，還有五角的星，兒童團有這樣的旗子。學校裏有這樣的旗子，蘇維埃也有這樣的旗子。

紅旗呀！紅旗呀！你到處都飄揚起來呀！

此外，亦有慷慨激昂的《擁護蘇維埃歌》，歌詞中號召工人農民為了蘇維埃到戰場上去勇敢作戰，「萬眾頭顱拼一擲，奮命不顧身。」^⑥課本中還提到了嶄新的儀式和節日——全蘇大會和十月革命紀念日，並作了解釋：1931年中華全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特意選定於蘇聯十月革命的紀念日11月7日開幕，以後年年此日蘇區都要舉辦紀念大會^⑦。在慶典和儀式中，革命的意義獲得重溫，蘇維埃政權的凝聚力也得到提升。

這種認同性建構似乎是相當成功的。紅軍長征離開之後，記者陳賡雅到蘇區進行調查時仍發現「舉凡赤黨開會儀式、口號標語、主義意義，質之白叟黃童，恕其無罪，莫不對答如流」^⑧。

而圍剿紅色根據地的國民黨在蘇區小學教材中則被描述為全體蘇區人民、乃至全中國人民的敵人，以破壞者的形象出現。課本中列舉了國民黨的罪行，如1931年發生的十六省大水災是國民黨軍閥造成的，因為他們盜用修堤的經費來進攻蘇區和紅軍。全國一萬萬的災民，沒飯吃，沒衣穿，國民黨不但不救濟他們，反驅逐他們，槍殺他們。不僅如此，國民黨還簽訂賣國密約，把上海送給各帝國主義共營，把整個華北賣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殖民地，西藏和西康任聽英帝國主義侵佔，南海島嶼任聽法帝國主義侵佔，並向美英各帝國主義大借外債^⑨。蘇區兒童的切身體會——鹽價畸高，當然也是國民黨封鎖造成的^⑩。

圍剿紅色根據地的國民黨在蘇區小學教材中被描述為全體蘇區人民，乃至全中國人民的敵人，以破壞者的形象出現。課本中列舉了國民黨的罪行，如1931年發生的十六省大水災是國民黨軍閥造成的，因為他們盜用修堤的經費來進攻蘇區和紅軍。

教材隨後號召學生為推翻國民黨統治而努力奮鬥：「我們為要推翻國民黨統治，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就要大家動員起來，參加大規模革命戰爭，爭取全江西及臨近幾省革命首先勝利，乃至全中國蘇維埃的革命勝利。」^⑤課本中一些童謠詩歌以此為內容：「梭鏢磨得光，捉賊先捉王；肅清反動派，打倒國民黨。」^⑥

四 對原生態農民的組織性規訓

原生態的農民自由散漫，缺乏組織性、紀律性，不能滿足蘇維埃政權的要求。要使他們如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一書中所言，「可以被駕馭、使用、改造和改善」，成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發揮出最大的潛力，就必須對其加以規訓，因為「規訓 (紀律) 是一種能夠用最小的代價把肉體簡化為一種政治力量同時又成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統一技巧」^⑦。這種近代以來才出現的特殊的權力技術和目標顯示出了蘇維埃共和國本身已具有相當的現代性。

蘇區小學教材中透露出當時國家對農民進行的最基本的、組織性的規訓。每一個農民都按照不同年齡、性別被編入不同的組織當中，在當時的蘇區，24至45歲之間的男子都必須參加赤衛軍，16至23歲之間的青少年必須參加少先隊，9至15歲之間的少年兒童則必須參加兒童團。一篇課文以孩子的口吻講述了他全家被組織化的情況：「爸爸加入了赤衛軍，哥哥姐姐加入了少先隊，我加入了兒童團，弟弟現在只有六歲，再過一年也要加入兒童團。」^⑧加入組織之後，勢必要進行紀律性的規訓，比如最簡單的軍事操練^⑨：

操場上，大家同遊戲，哥哥拿着紅旗，我肩紅棍，妹妹喊口令：「衝鋒！衝鋒！前進，前進！」

學生的日常生活也受到有計劃地規制，不能隨心所欲。有一篇課文如同流水賬般記錄了學生一天的生活：天亮起牀、洗漱、讀書、上課、午飯、上課、晚飯、遊戲、讀書或開會、九點鐘睡覺^⑩。這不禁令人聯想起福柯提到過的那個巴黎少年犯監管所的作息時間表。作為現代學校教育，蘇區的小學與巴黎少年犯監管所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對尚不符合國家要求的人身進行改造。

農民即便經歷了土地革命，仍然對政治不感興趣，缺乏參政意識。「有些群眾，不到選民大會，說我們知道甚麼，讓他們去幹就是了。」^⑪要讓農民養成參與政治生活的習慣，最基本的就是告訴他們開會的時候應該去參加。小學教材努力向學生灌輸參會的意識和會議紀律，包括選舉的程序，形同入門指南^⑫：

兒童團開會了 兒童一個一個 都到會
兒童團開會 一個一個都說話

農民即便經歷了土地革命，仍然對政治不感興趣，缺乏參政意識。要讓農民養成參與政治生活的習慣，最基本的就是告訴他們開會的時候應該去參加。小學教材努力向學生灌輸參會的意識和會議紀律，包括選舉的程序，形同入門指南。

另一篇課文說得更具體^④：

隊長報告說：「選一個主席出來。」有一個兒童說：「我選隊長。」又有一個兒童說：「我選阿三。」最後隊長說：「舉手表決。」結果贊成阿三的舉手多，就以阿三當主席。

在此基礎上，課本對兒童團組織的職能加以具體的指導。瑞金洋溪村的兒童能夠表演各種遊戲歌舞活報，還會通過寫短篇牆報和畫報，做思想鬥爭，寫批評文章，被樹為蘇區兒童的學習榜樣^④。興國縣方太鄉的兒童團和少先隊，配合放哨，成功地識破了一個白軍偵探，也被寫進課本。其整個偵破過程被詳細記錄下來：先是從路條的式樣、路程、期限，以及持有人職業身份上發現破綻，又察覺來人口音與自稱的地方不符，再搜身找到反動文件，最後押送政府^④。學生如同手把手地受到了一次站崗盤查的訓練。

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稍作修改後也被寫入課本，以期規範人們的行為：「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貧苦工農一點東西；打土豪歸公。」「上門板，捆禾草；買賣公平，說話和氣；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搜敵人腰包，不亂屙屎尿。」^④

雖然與福柯所說的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以及檢查這三種規訓手段相比，蘇維埃共和國對農民的規訓還顯得非常初級，但是紀律和行為規範的確立已經開始使純樸的農民轉變成為可供國家利用的資源。

雖然與福柯所說的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以及檢查這三種規訓手段相比，蘇維埃共和國對農民的規訓還顯得非常初級，但是紀律和行為規範的確立已經開始使純樸的農民轉變成為可供國家利用的資源。



《共產兒童讀本》第二冊

五 對農村資源的動員

摧毀了舊的鄉村經紀，破除了固有的權力文化網絡，以及對農民加以組織規訓之後，蘇維埃的權力終於可以滲透到農村基層，最大限度地動員農村的人力物力資源服務於革命戰爭，從其對少年兒童的利用即可見一斑。

1933年9月開始，中央蘇區紅軍投入到艱苦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隨着國民黨的圍剿壓力愈來愈大，紅軍要求基層農村支援前線的力度也愈來愈大，從1933年9月到1934年9月，蘇區先後發動了五次擴紅突擊運動，課本中也出現了鼓勵當紅軍的文字，比如一段題為《紅軍好》的歌謠^④：

紅軍好，紅軍好，當紅軍最榮耀，為蘇維埃政權而奮鬥，享受優待條例十八條。

踴躍參加紅軍去，反動政府快打倒。

看明朝，紅旗到處飄。

但是，許多分得田地的適齡青年不願參加紅軍，即使勉強被編入紅軍，不是哭哭啼啼，就是吵着要回去，要麼就是入伍不到幾天便要大批地開小差^④。於是兒童被要求發揮作用，鼓動成年人參加紅軍。課本中記述了興國縣崇賢區一次擴紅大會的情況。當看到成年人不願自動報名當紅軍的時候，一群十四五歲的兒童站出來責備他們可恥，並且率先要求報名當紅軍。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成年人受到鼓舞，也紛紛報名。全區擴大了四百多名新戰士。到縣政府擴大紅軍委員會集中時，再把報名的兒童篩下去^⑤。

據1933年《紅色中華》報導，「在長汀、興國、萬太、博生、瑞金、永豐有許多兒童團員能一人鼓勵七、八名甚至十多名青年哥哥去當紅軍。」^⑥興國縣兩個月間由兒童動員參軍的青年就有二百餘人。在瑞金各區，大部分兒童都能鼓動自己的父親、叔叔和親戚去當紅軍^⑦。

對於開小差的戰士，兒童能夠以各種宣傳和羞辱的方式迫使其歸隊，課本中講到一個例子：興國縣鼎龍區的李興贊開小差回家。村裏的兒童，首先鼓動自己爸爸媽媽幫助李興贊家裏耕田、耙田、砍柴，又到各處募捐，鼓動青年婦女做草鞋套鞋，募集一大批的物品，送給包括李興贊在內的開小差的戰士。受到這樣的擁軍待遇，開小差的戰士承受很大的道義上的壓力。兒童還「用一些宣傳鼓動的言語，和別的一切巧妙的法子」^⑧，最終促使李興贊回到前線去。

同時，兒童還被要求做大量的支援前線工作，湘贛蘇區兒童團的扇子隊被樹為其他地區兒童團學習的榜樣，他們見了紅軍便敬禮歡迎，為紅軍打扇，喊口號，唱歌跳舞^⑨。課本中有不少課文記敘了群眾擁軍支前的情景，如為即將上前線的紅軍送果品、送茶錢，少年兒童團送草鞋，婦女送套鞋和布鞋，還有送乾糧袋、包袱、碗子、毛巾等^⑩。沒有去當紅軍的人家平日還要定期送果品到鄉政府開茶話會請紅軍家屬吃；家裏有點心，也要想着先送到紅色醫院裏去給傷病兵吃^⑪。

為支援前線，農民被號召節約糧食和家用，捐獻給紅軍。課本中提到興國縣的兒童開會決定把買零嘴吃的錢節省起來，捐作紅軍戰費；還有的兒童每人節省一升穀子，積少成多，也有不少的數目。有不少工人在他們的帶動下也加入節省運動^⑫。據《紅色中華》報導，1933年3月，閩贛兩省各縣兒童局書記聯席會議決定給紅軍購買共產兒童號飛機和高射炮，各地兒童踴躍響應，在短短的三個月裏，江西蘇區的兒童募捐光洋944元，送到了前方。1934年5月少先隊還節省了米158,367升，穀子53,296升，大洋913.5元，草鞋26,800餘雙，套鞋170多雙，菜乾180多斤^⑬。

大量青壯年男子上前線打仗，後方的農業生產就成了問題，婦女、兒童都成了田間地頭的勞動力。在課本中提到，興國縣除紅軍家屬和脫離生產出外工作的人外，能勞動的青年成年婦女，都一律參加耕田隊。原本不會犁田耙田的婦女要學着去做。十歲以上的兒童，也大部分參加耕田隊^⑭。

為支援前線，農民被號召節約糧食和家用，捐獻給紅軍。課本中提到興國縣的兒童開會決定把買零嘴吃的錢節省起來，捐作紅軍戰費。有不少工人在他們的帶動下也加入節省運動。

江西省兒童局發動各地兒童建立「兒童菜園」，把收穫的蔬菜送給紅軍和紅軍家屬。據1933年6月統計，江西全省共建立兒童菜園413個^⑥。課本中也講到兒童菜園的情況，春天冬天各有不同的品種種植，孩子們要自己鬆土播種和拔草，自己撿狗糞或者用茅草漚肥，並且還展開競賽。內容說得較為詳細，便於學生學習掌握。此外，還有許多兒童都加入捉蟲隊，到田間除害，捉蟲的方法說得也比較詳細，指出擦死不合衛生，應改用鉗子鉗死，或用紙片包好擦死^⑦。

六 結論：蘇區教育的實質

蘇區的教育遠不僅僅是掃除文盲，教授農民以知識，這種教育其實是蘇維埃政權對蘇區農民進行動員和規訓的重要工具。中國共產黨發掘農村基層社會人力物力資源的全部過程都在課本中體現了出來。

教育自始至終是蘇區建設的重中之重。根據地甫創之初，學校即大規模地開始創辦，短短兩三年之內工農業餘教育和兒童教育就發展了起來，並且達到一定的規模。1934年《紅色中華》報導：「在中央蘇區的江西、福建、粵贛、瑞京〔瑞金〕等地，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我們有了三千一百九十九個列寧小學，學生約達十萬人。」^⑧

蘇區的兒童教育，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當時又叫「強迫教育」）。江西少共省委兒童局發布的〈督促貧苦兒童去讀書〉通知明確說：「反對父母不准其子女去讀書的現象，經過幾次宣傳不聽後報告蘇維埃政府處罰之。」^⑨閩西龍岩縣龍池區第六鄉，學生一次沒到「警告」，兩次沒到「示眾」，三次沒到日校罰洋十元，夜校罰洋三斤。第十三鄉的學生未經請假不到校即罰二角^⑩。

為甚麼蘇維埃政權對教育如此重視？從本文對小學課本的分析可以看出，蘇區的教育遠不僅僅是掃除文盲，教授農民以知識，這種教育其實是蘇維埃政權對蘇區農民進行動員和規訓的重要工具。中國共產黨發掘農村基層社會人力物力資源的全部過程都在課本中體現了出來。

正因為如此，即使在反「圍剿」戰爭最危急的時刻，蘇維埃政權也沒有放鬆教育工作。1933年7月7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第四號訓令道出了其中的實質：「在目前一切給予戰爭，一切服從鬥爭利益這一國內戰爭環境中，蘇區文化教育不應是和平的建設事業，恰恰相反，文化教育應成為戰爭動員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⑪

註釋

① 曾慶圭整理：〈沸騰的黃陂、小布地區〉，載《關山陣陣蒼——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頁286。

② 杜贊奇將他們分為「盈利型經紀」和「保護型經紀」兩類。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第二章，「清末鄉村社會中的經紀統治」，頁37-51。

③⑧⑨⑩⑪ 中央教育部編：《共產兒童讀本》，第四冊，載贛南師範學院、江西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編：《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南昌：江西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內部發行，1985），頁20；20；23；22；22；23；21。

④⑭ 湘贛省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列寧初級小學校適用國語讀本》，第一冊，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42。

- ⑤⑥⑦⑧⑨ 湘贛省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列寧初級小學校適用國語讀本》，第二冊，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46；47；46；44；47。
- ⑩⑪⑫⑬⑭ 湘贛省蘇教育部：《列寧初級小學校適用常識讀本》，第四冊，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51；53；53；53；52。
- ⑮⑯⑰⑱⑲⑳㉑ 中央教育部編：《共產兒童讀本》，第六冊，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33；36-37；33-34；34；35-36；39；40-41；32-33。
- ㉒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31。
- ㉓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概念，雖然他論述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華北農村，但是從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描述的情況看，應該也可以將此概念運用於湘、鄂、贛等中南地區的農村。
- ㉔④ 中央教育部編：《共產兒童讀本》，第一冊，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3。
- ⑤ 〈江西省委給中央報告〉(1928年4月15日)，載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四輯(南昌：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內部發行，1987)，頁139。
- ⑥⑦⑧⑨⑩ 中央教育部編：《共產兒童讀本》，第三冊，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15；11；15；12；12。
- ㉑ 閩西蘇維埃政府通知第十九號——關於逢圩改用公曆事(1931年2月16日)，載中央檔案館、福建檔案館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蘇維埃政府文件·1931年—1933年)》(福州：中央檔案館、福建檔案館，內部發行，1985)，頁32-33。
- ㉒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中央教育部編：《共產兒童讀本》，第五冊，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27；25；29；28-29；30；28；31；26。
- ㉒⑳ 中央教育部編：《共產兒童讀本》，第二冊，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5；8。
- ㉓ 陳慶雅：《贛皖湘鄂視察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28。
- ㉔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154、248。
- ㉕ 按城：〈閩西選舉運動中的成績〉，《紅色中華》，1932年3月23日，第7版。
- ㉖ 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組編：《中央紅軍五次反「圍剿」資料選編》(上海：復旦學報編輯部，1979)，頁22。
- ㉗ 耀邦：〈共產青年團領導之下的蘇區共產兒童團三個月來的活躍情形〉，《紅色中華》，1933年9月27日，第5版。
- ㉘ 曾凱春：〈瑞金各區兒童工作第二次競賽總結〉，載贛南師範學院、江西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編：《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六集(南昌：江西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內部發行，1985)，頁55-56。
- ㉙ 曾光：〈少先隊節省三升米運動的初步檢閱〉，《紅色中華》，1934年6月16日，第1版。
- ㉚ 李才蓮：〈江西各縣兒童局書記聯席會議的總結〉，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六集，頁42。
- ㉛ 王昌期：〈蘇區教育的發展〉，《紅色中華》，1934年9月29日，第4版。
- ㉜ 江西少共省委兒童局：〈督促貧苦兒童去讀書〉，載《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彙編(1927-1937)》，第七集，頁43。
- ㉝ 謝濟堂編著：《閩西蘇區教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頁75-76。
- ㉞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老解放區教育資料》，第一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頁34。